

周易與中國企業文化精神

(提綱)

張善文

要研究此問題，必須先瞭解兩個基本概念：一是何謂《周易》？二是何謂「文化精神」？

這兩個概念，用最簡約的語言可試為界定如下：

《周易》者，盛行於西周時代的揭示事物變化哲理的書，以八卦、六十四卦為象徵符號，配以闡釋六十四卦哲理的卦爻辭文字，相傳孔子所作《易傳》七種十篇(也稱《十翼》)後世亦附經並行，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古代哲學著作，也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最重大影響的「十三經」中的第一部經典作品。(【案】班固《漢書·藝文志》於經籍先列「易類」，此後《易》遂冠居群經之首。)

文化精神者，指人類歷史上創造的輝煌文明，在歷代先哲(或智者)極力推廣並蔚為教化的過程中，所逐步積澱而形成的足以體現文明淵源、教化內涵、思維方式、行為準則等諸方面交互融貫的民族氣質特徵，即因民族文化之熏陶而產生的具備諸多傳統美德的精神總和。(《易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此言之，「中國文化精神」所涵蓋的中國傳統思想道德之豐厚，是可想而知的。(【案】筆者近有《易傳中之文化命題考論》一文，詳述「文化」概念之漢語語源問題，亦針對此角度抒論。)

那麼，《周易》與中國企業文化精神之關係何在呢？換言之，《易》中含有哪些展示中國企業文化精神的內容呢？筆者曾撰《易道之內涵探微》，援引「易道廣大，無所不包」一語，以為「易道」的涉及面至為廣闊，非一時、一角度所能盡述。而《周易》中所體現的中國企業文化精神實亦如此，亦當從多角度、多層次分析之。

今擇其關乎宏旨者論之，略舉如下十端為說：

一曰，《易》涵「對立和諧」的精神。

事物總是寓含著對立的兩方面因素，而真正的和諧又往往於對立之中求得——這便是辯證的思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的精神。《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此語甚確。(《易》中之陰陽符號即作：陽畫—陰畫--。以此兩畫三疊即是八卦：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八卦兩兩相重，便是六十四卦。其中皆含陰陽之旨。以此為象徵，古人稱為「天下之能事

畢矣」。)陰陽又可為君子、小人的象徵。宋儒邵雍《擊壤集》有《君子吟》曰：「君子思興，小人思壞。思興召祥，思壞召怪。」又有《唯天有二氣》曰：「唯天有二氣，一陰而一陽。陰毒產蛇蠍，陽和生鸞鳳。安得蛇蠍死，不為人之殃！安得鳳凰生，長為國之祥！」所吟即為陰陽之道。事實上，陰陽是相依互存的，譬如我們在提倡企業運作過程中的君子風範的同時，往往基於小人行徑在處處作祟。因此，透過對立與和諧的重重夾縫，我們探索著易學思維的重大準則。

二曰，《易》涵「變化發展」的精神。

《周易》哲學的「奇特」之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於它所反映的事物永恒地發展變化的閎奧哲理。司馬遷《史記》指出《易》「長於變」(《太史公自序》)，頗為精到。(當前，西方諸國漢學界對《周易》書名的英文音譯通常作 *I-Ching* 即《易經》；而英文意譯則多作 *The Book of Changes* 即《變化的書》，便是立足於「易」字本義，至為確切。)我們生存的世界在變化，我們步入的人生在變化，我們的企業發展在變化。如何適應瞬息萬變的環境？如何把握無可回避的事物變化規律？這或許仍然是今天的企業界人士研讀《周易》所欲尋求的一方面哲理啓示。

三曰，《易》涵「自強不息」的精神。

清華大學的校訓寫著「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個字，這是當年清華首任校長梅貽琦先生所充分認可的《周易》的警策之語，其寓意何等深邃！(案，《乾》卦之《大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之《大象傳》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謂之「自強不息」者，乃是對「君子」奮發向上精神的深切期盼。中國歷代有多少卓越之士，便是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創造了不勝枚舉的中華民族的歷史輝煌。同樣，真正有作為的企業，倘無這種精神，亦難以有效地開拓前景。

四曰，《易》涵「進德修業」的精神。

古代聖賢的教育思想，往往含有超越時空的真理蘊蓄。讀到「進德修業」這樣的名言，我們不禁萌起要對今天的教育進一步審思的衝動。當今教育的根本宗旨，各類學校培養學生的目標，豈不盡在此四字中嗎？中國教育家一貫強調「道德文章」的精神實質。(何謂道德文章？吾師六庵教授叩拜摯友之慈母，是為道德也。吾師以詩文作品求正於諸弟子，是為文章也。)真正的文化教育，外此又將欲何求呢？德業兼備，內修外美，實是我們應努力追求的「大道」。(我曾為某企業領導題「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八字，原典亦出《周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五曰，《易》涵「憂患立身」的精神。

《易》為「憂患之作」，這是前代聖哲的不刊之至言。(《易》歷三聖，伏羲因自然生存之憂患而作八卦，文王因人生政治之憂患而演六十四卦，孔子因社會禮法之憂患而作《易傳》，故《易》多「危辭」，以示誠也。)孟子有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今天的人們，若能帶著當代的「憂患感」(含個人的、國家的、倫理的、政治的等等)，深入領悟《周易》思想，或許可以從中發現一座溝通古今的愈經憂患愈堅不可摧的精神之金字塔。

六曰，《易》涵「協理三才」的精神。

古人十分注重天地自然，「三才」之旨，便是「天地人」三者相互協調的道理。(才者，質也，宇宙間最基本之物質也。)漢代學人頗為強調「天人感應」、「天人合一」，即屬此理。今天的人類，逐漸遠離了大自然，甚至在惡性地破壞著大自然。(電視訊息：人類每耗一度電，便增零點幾公克二氧化碳。)有識之士正在擔憂著人類的生存前景。當此之時，回思《周易》「三才」之道的哲理，思索如

何科學地「協理」之，無疑是極有意義的。（企業與環境的問題由此亦可悟出道理。）

七曰，《易》涵「原始要終」的精神。

事物的發展，始和終是兩大關鍵，往往與因果密切聯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謂始終當如一。南北朝間學者顏之推撰《顏氏家訓》，有「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之語，即言「初始」之重要性。顯然，「始因終果」與「善始善終」的喻旨，統屬《周易》「原始要終」的哲學義理，值得我們時刻重視。（《說文》五百四十部首，始於一，終於亥，即寓原始要終之理。）

八曰，《易》涵「敬慎无咎」的精神。

所謂「无咎」，即指「善補過」之意。我們今天不斷強調的「兢兢業業」的工作精神，不就是追求儘可能少犯錯誤而「善補過」嗎？（吾校某老教授，謂每上課便生畏意，此即敬慎之本心也。）孔子讚賞顏回，便在於這位弟子「不遷怒」、「不二過」的品格。《周易》的「敬慎无咎」之道，實亦不乏深厚的現實意義。

九曰，《易》涵「為君子謀」的精神。

《周易》哲理往往體現於扶持陽剛君子，貶抑陰邪小人。孔子以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北宋哲人張橫渠先生揭出「《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的觀點，至為精闢。（《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而筮，以為大吉。示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此之謂也。）這對於今天，我們的道德文明的建樹與改良，不正有深刻的借鑒作用嗎？

十曰，《易》涵「未濟終焉」的精神。

《未濟》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終，喻示「未成功」之理，展示了事物的「完美」或「成功」只是相對的，「缺陷」或「未成」卻是時時伴隨著前者而存在。清人龔自珍《己亥雜詩》有云：「未濟終焉心縹緲，百事翻從缺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詩中隱隱透露著因缺陷而求完美，俟夕陽以成朝日的積極理念。於是，悟得「未濟終焉」的旨趣，則不難明白——不論事業的成功達到何種境界，我們腳下的路都不應該劃上句號吧！（今所謂歸零者，亦合此理。）

如前所述，以上十點只是就「關乎宏旨者」論及《周易》所涵中國企業文化精神之大端，其中各項之間的思想蘊蓄或哲理指向往往是旁通互聯的；而在相互緊密「聯通」的同時，則呈現著中國企業文化精神的不可分割的「融貫性」或「綜合性」。因此，分析探討《周易》與中國企業文化精神，務必以互為聯繫的觀點為指導，將之視為一種哲學的或思想的「文化精神體系」，切不可把每項「精神」孤立起來作呆板的理解。

古代不少學者對《周易》中所含藏的深厚的文化精神探之甚篤，用情至深。北宋理學家邵雍的一首《安樂窩中吟》七言詩曾寫道：

安樂窩中事事無，唯存一卷伏羲書。
倦時就枕不必睡，歡後攜筇任所之。
準備點茶收露水，堤防合藥種魚蘇。
苟非先聖開蒙吝，幾作人間淺丈夫。

作者隱居在「安樂窩」中，自稱日日無事，唯讀《周易》，深研其道，無論居家還是出行皆不離其書，乃至詩的尾聯發出作者內心深處的感歎：若非先代聖人用易理來開啓後學的蒙稚狹吝之心，吾輩幾乎要成為一個庸俗無知的「淺丈夫」了！

邵子所歎之「淺丈夫」，無疑即是《繫辭上傳》所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可見前賢對《易》中所含之文化精神與人生之密切關係的深刻認識。（【案】此類以《周易》怡情養性、探研物理的例子，中國古人頗曾有之。如宋代福建邵武人葉采，字仲圭，號平巖，其《書事》詩云：「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時。」立意即頗具濂洛風雅。見《宋詩紀事》卷四十九。）

時至今日，站在新時代的高度來認真領會《周易》思想中所蘊含的中國企業文化精神的問題，則當又有更深一層的寓義。面對世界企業文化日新月異的急速發展，我們期盼著振興中國的「國學」，期盼著挖掘古代哲學中蘊含的豐富的思想價值，期盼著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建立健全富有東方思維特色的華夏國學體系，甚至期盼著我們的國學思維足以為新世紀所亟需創立的「人類生存哲學」的肌體注入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論的基因——對《周易》與中國企業文化精神的深入細密的探討，顯然十分有益於諸方面「期盼」的實現，這無疑也是我們擁有悠久的優秀民族文化的一種無與倫比的自豪。

公元 2007 年 6 月擬稿
公元 2009 年 9 月修訂